

现当代文学研究

时代之真与诗性之思

——王国平报告文学创作论

何 英

摘 要：王国平是当代报告文学领域兼具新闻素养与文学自觉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始终扎根时代现场，跨体裁的写作积累互为滋养，形成鲜明、统一的艺术品格。从题材谱系的精神建构、诗性纪实的美学表达、人本书写的价值锚定三个层面展开系统分析，可见他在新闻真实与文学审美之间试图寻找平衡。其以“意向性”为核心的意象化叙事拓展纪实文体的诗性空间，以“祛魅化”的还原笔法守护人物书写的伦理尊严，走出一条兼具温度与深度的建设性写作道路。这一创作实践不仅实现了非虚构写作“诗与真”的辩证统一，更以人本立场为纪实文学的时代价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关键词：王国平；报告文学；诗性纪实；意象化叙事

作为纸媒编辑，同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王国平的写作始终在新闻与文学的交界地带持续深耕，十余年间构建起多体裁联动的创作格局。在报告文学领域，他先后推出《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当代焦裕禄：廖俊波》《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地球友好，你在奔跑》四部作品，从基层公仆典型逐步拓展至脱贫攻坚、绿色发展等重大国家叙事，形成了题材聚焦、风格成熟的创作谱系，作品先后斩获中国新闻奖、全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一等奖等多项全国性荣誉。2014 年，《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摘得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2026 年，《地球友好，你在奔跑》入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

告文学奖提名名单，创作实绩获得认可。与此同时，他在其他领域的写作从未与报告文学割裂，散文集《汪曾祺的味道》沉淀出的语言美学，《风月无边看未了》张扬的地域叙事，人物访谈录《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对生命重量的体悟，人物传记《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积累的立传经验，共同赋能他的报告文学创作，让他的纪实写作拥有更丰厚的人文底色与更成熟的艺术表达。他的作品并非零散的体裁拼接，而是在精神内核、审美趣味与写作伦理上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系统考察他的创作，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其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与时代价值，进而呈现一位记者型作家完整的创作路径与文体贡献。

一、时代锚点： 题材谱系的精神脉络与自觉建构

报告文学素来被视作时代的文学记录,以非虚构为文体根基,通过切近历史现场、捕捉真实细节,全景式地留存社会变迁中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王国平的写作正契合这一文体特质,始终与时代进程同频共振,无论是报告文学对重大现实题材的聚焦,还是其他文体对人与事的深度开掘,都暗含着一清晰的精神线索,即在时代洪流中打捞具有持久价值的人性闪光,用文字为行进中的社会留存精神标本。“真正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写作形态,它描画出主体变动不居的心路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存活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历史。”^①王国平的纪实书写沿着个体担当、群体互助、社会协同的逻辑层层推进,形成连绵的时代精神传记。从《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中扎根北川震区、带病坚守的副县长兰辉,到《当代焦裕禄:廖俊波》里深耕欠发达县域、用生命追赶发展的县委书记廖俊波,两位基层公仆前后呼应,共同书写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责任与坚守。兰辉在亲人遇难的悲痛中扛起交通重建与民生保障重担,最终殉职于山路巡查一线;廖俊波扎根闽北山区,以“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的劲头推动县域发展,二者身处不同语境,却同样诠释了基层执政者的公仆本色。在此基础上,《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将叙事视野从个体扩容至群体,追踪浙北安吉县黄杜村向中西部捐赠茶苗的共富实践,把宏大的脱贫攻坚叙事落实到一片茶叶、一抔泥土的具体场景中,呈现民间自发互助的力量。《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以台州大陈岛青年的视角切入,生动展现“大地—海洋—云端”三位一体环保格局,呈现全社会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面貌。而《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则是这条精神谱系向文化领域的延伸,无论基层干部、普通村民还是学者匠人,本质上都是各自岗位上负重前行的奋斗者,有着铺路石式的坚守,最终汇聚为同一时代的精神底色。

这份选题上的精准与自觉,既源自其“记

者+作家”双重身份的内在驱动,也在其文论写作中有着清晰的理论呈现。他曾坦言:“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经常参与重大主题报道。踏着新闻前辈的足迹,我也想在主题报道中融入一点文学的味道,试图在吃透要求的基础上,寻找适宜的结构,捕捉灵动的意象,挖掘鲜活又恰切的细节,让人物清爽爽地站立在纸面之上。”^②这一判断可以看作他全部创作的底层逻辑。作为媒体人,他对社会热点、政策走向有着天然的职业敏感,能够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获取鲜活的一手素材;作为文学写作者,他又不满足于新闻的即时性与表层性,始终致力于对素材进行沉淀、打磨与升华。报告文学创作“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和检验”^③。这份对时间性的追求,使其创作始终保持着对热点事件的审慎态度,在事件热度最高时迅速介入获取一手素材,再以扎实的采访与文学打磨完成沉淀,最终交付超越新闻时效的作品。四部报告文学的创作均遵循这一逻辑,从典型人物的事迹报道到深具人文厚度的纪实作品,完成的是从“新闻速朽”到“文学留存”的转化,本质上是以文学的烛照打捞时代现场中具有持久价值的精神片段。这种超越表层记录、追求精神留存的创作意识并不局限于报告文学,在《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的写作中同样一以贯之。为建筑设计领域的知名院士立传,本身不依赖热点时效,但他没有停留在履历梳理与成就罗列的层面,而是深入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循着其建筑实践的路径打捞一代知识分子的治学品格与家国情怀。如果说报告文学让瞬间的事件拥有长久的重量,那么人物传记则让个体的人生汇入时代的精神长河,二者内在的创作逻辑高度统一,都不满足于表层的记录,而致力于将具体的人与事,转化为具有时代价值的精神标本。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这种对“精神标本”的自觉采集,体现的正是写作者对时代命

① 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第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② 王国平:《写在前面的话》,《文学的目光掠过新闻的湖面》,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2。

③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报告文学篇)》,《文艺报》2015年4月3日。

题的积极回应与对历史书写的责任担当。王国平的题材选择从来不是被动的跟风与猎奇,而是建立在清晰的创作自觉之上的主动建构。跨体裁的写作积累,让他既能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时代脉动,也能以文学人的深沉挖掘精神价值;既能把握宏大叙事的时代方向,也能体察微观个体的人性温度。不同题材和不同体裁的作品彼此呼应、相互阐释,共同构成一份立体的时代精神档案,这也是其创作超越一般纪实写作的格局所在。而这份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的审美辨识度,则要归功于他在叙事美学层面的自觉探索,重心正是贯穿于他所有作品的意象化叙事思维。

二、诗性纪实： 新闻真实与文学审美的融合路径

真实是纪实写作的立身之本,文学性是艺术魅力的核心来源,如何在严守非虚构底线的前提下赋予文本充分的审美品格,是王国平始终在探索的根本命题。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将叙事话语划分为“故事”“叙事”和“叙述”三个层次,^①其中“叙事”是“故事”得以呈现的文学化方式,这一区分恰好为理解报告文学如何处理“真实”与“审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参照。多年的新闻训练筑牢了王国平的真实底线,《汪曾祺的味道》《风月无边看未了》等散文写作则锤炼了他的审美能力,二者结合最终形成诗性纪实的创作路径: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根基,以意象化提炼为升维,以节制从容的语言为质感,努力在真实与审美之间寻找精准的平衡点。这套创作方法贯穿于他所有的纪实类写作,也成为其报告文学鲜明的艺术特色。

王国平始终强调报告文学作家要扎根生活现场,在他看来:“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始终‘在路上’。动笔前,作家应该‘在路上’,去丈量人物的心灵长度,去捕捉大地的生机勃勃,从中梳理出故事的脉络。”^②这份对现场的执着,构成其纪实写作坚实的伦理底色。他不依赖二手材料进行拼接式写作,每一部作品都建立在大量实地走访、深度访谈与文献考证的基础上,

带有鲜明的田野调查特征。写《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时,他沿着北川的崎岖山路重走兰辉的巡查路线,采访其同事、帮扶群众与家人,打捞其大学时代的文学爱好、震后的心理创伤、工作中的硬朗与温情,甚至查阅大量工作档案与遗留资料,让人物形象建立在无数可核实的细节之上。创作《当代焦裕禄:廖俊波》期间,他赴福建政和、武夷新区实地走访,循着逝者的工作路线重走山路、工业园区和拆迁现场,从工作人员的回忆、司机的行车记录、办公室的遗留文件中,还原出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真实的工作状态与生活细节。为完成《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他跟踪茶苗培育、运输、移栽的完整链条,深入捐赠方与受益方的日常,记录下捐赠仪式上的气温风向、老茶农手上的茶渍厚茧、受助农户的语气神态,用微观细节支撑起宏大叙事的真实度。《地球友好,你在奔跑》则将笔触投向民间绿色实践的广阔现场,全书围绕“千万工程”“蓝色循环”“蚂蚁森林”公益行动三大板块展开,他深入浙江台州的偏远山村,蹲点垃圾分类试点的日常运转,记下村口的垃圾分类台账、保洁员的清运路线、村民从抵触到接受的态度转变;他跟随海洋环保志愿者登船,记录近海塑料打捞的作业流程、滩涂清理的日晒雨淋,还原海洋塑料治理的真实难度;他也走访“云上种树”项目的一线参与者,梳理数字公益从屏幕端落地到荒漠现场的完整路径,积累大量一线工作日志、基层治理台账、普通参与者的口述记录等一手材料,以田野式的深扎,让生态文明的宏大主题落地为可触摸的日常实践。

这种深扎现场的写作习惯,同样体现在他的传记与访谈写作中。创作《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时,他不满足于公开出版的建筑图集与项目履历,不仅系统梳理了主人公师从梁思成、扎根西北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脉络,还多次赴西安实地走访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芙蓉园等标

①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第7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

②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报告文学篇)》,《文艺报》2015年4月3日。

志性项目现场,对照设计手稿核对建筑细节,走访当年的项目团队与身边工作人员,还原张锦秋常年泡在工地、对斗拱形制与檐角弧度反复打磨的创作日常,打捞其建筑思想背后的个人选择与时代印记。创作《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时,他提前梳理每一位访谈对象的学术脉络与人生节点,带着案头问题登门交流,在面对面的对话中不断追问细节,受访者书房里泛黄的手抄笔记、沿用数十年的旧钢笔都成为他体察人物的切口,打捞被宏大叙事与成就光环遮蔽的人生片段和有意味的细节。在他看来,只有真正走进人物的生活现场、触摸到事件的真实肌理,写出来的文字才有重量、有温度。这种近乎人类学式的精细打捞,为他的文学表达筑牢不可动摇的事实根基,也让“诗性”有了坚实的落点,不至于沦为空洞的修辞。

“诗性是指人在生命体验中感受到的意味深长的且具有丰富内蕴的精神体验,有时候是难以言传的灵性、意趣、韵味,是指向人类内在心灵中的圆满、充实、理想的精神追求。”^①王国平的报告文学创作,正是将这份东方式诗性植入非虚构书写,形成鲜明的“诗性纪实”品格,以真实为不可动摇的根基,从事实肌理中打捞与升华诗意,让纪实的重量与文学的温润形成有机统一。

丁晓原曾经指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既内置于书写的对象之中,需要作者深挖细掘,同时在文本建构中又需要作者对提取到的事实质料作合审美性的呈现。基于叙事设计的全局,对材料进行有机的具有表现力的调度。”^②王国平的意象化叙事,正是对这一理念富有成效的实践。从哲学层面看,意象的生成机制可以借助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加以理解。胡塞尔指出,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其本质特征即指向对象的意向性活动,^③文学创作中的意象并非客观物象的简单复现,而是创作主体在感知、体验与想象活动中,将外在物象与内在情思相融合的产物。王国平在长期的现场采访中,其意识不断朝向兰辉巡查的山路、廖俊波行走的工地、黄杜村的茶园等具体对象,在持续性的意向活动中,这些物象的意义被不断充实、变样与持存,最终在创作阶段凝结为“石子”“速度”“叶子”

等核心意象。换言之,意象并非作者为作品贴上的外在标签,而是其在深度介入现实的过程中,从事实肌理中结晶出的意义载体。从符号学的视角审视,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将艺术定义为“把人类情感转变为可见或可听的形式的一种符号手段”^④,王国平笔下的核心意象正是这样的艺术符号,它们在保持与客观物象感性关联的同时,承载了丰富的情感结构与精神意涵。这一创作路径与中国古典诗学“立象以尽意”的传统形成深刻呼应。《周易·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⑤在“言”与“意”的张力之间,“象”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王国平的意象化叙事正是这一传统智慧在非虚构写作中的创造性转化,他不再依赖直白的议论(言)来传达精神价值(意),而是通过精心提炼的核心意象(象),让意义在叙事中自行显现。这种转化使报告文学摆脱主题先行的说教模式,回归到文学以形象言说的本体路径。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王国平锚定叙事对象本身的特质,抓取从人物与事件中自然生长出的核心意象,让它在叙事的不同节点反复浮现、不断深化,最终托举起作品的精神内核。《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中,“石子”意象从兰辉分管交通建设、殉职道路一线的人生轨迹出发,逐步延伸出民生通道、灾后重建之路、干群连心之路的多重隐喻。《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里,“叶子”意象贯穿全篇,茶芽出土的轻盈、流转运输的脆弱、成林连片的繁茂,每一处对茶叶的写实描摹,都精准对应着扶贫进程的不同阶段,也暗合

① 袁寒松:《浅谈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诗性》,第5页,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

② 丁晓原:《如何报告,怎样文学——新时代报告文学文体说》,《文艺报》2024年7月10日。

③ 参见[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④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第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⑤ 杜占明主编:《中国古训辞典》,第11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着产业背后精神重量的不断累积。《当代焦裕禄：廖俊波》中贯穿始终的“速度”，将人物的行事节奏与县域追赶发展的紧迫感深度嵌合；《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中的“奔跑”，既是个体践行环保理念的行动具象，也象征着中国生态治理永不止步的奋进姿态。这种意象化处理并非脱离事实的文学杜撰，而是深入事实内部，将其本就蕴含的诗意与逻辑自然打捞，让文学性从真实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从日常细节中萃取诗性的功力，植根于他长期的散文写作积累与成熟的审美趣味，对汪曾祺散文的持续研究，更是深刻塑造了他节制从容的诗性表达风格。他在《汪曾祺的味道》中专门探讨过汪氏语言“不着急”的叙事魅力，推崇“平缓缓、乐悠悠”的舒缓节奏，以及“淡得像温水”的语言质感，不是刻意打磨的光亮，而是岁月沉淀出的温润。这份审美追求深度渗透进他的写作之中，形成哀而不伤、赞而不溢的表达尺度。写兰辉殉职后的群众悼念，他不铺陈浓烈的悲恸，只记下他给学生写的初中毕业留言和明信片，以朴素物象承载深沉哀思；写廖俊波离世后的民间追思，他不做直白的抒情呐喊，只提及办公室常备下乡的雨鞋、草帽，静物的静默并置，胜过千言万语的悼词。书写人物的坚守与韧性时，他常宕开一笔描摹周遭景物，山路上顽强生长的草木、茶垄间缓缓流动的晨雾，皆以自然万物的生长姿态暗喻人的精神品格，让情感在叙事留白处缓缓流淌。这种闲笔不闲、以物寄情的写法，正是汪曾祺式散文笔法在纪实写作中的化用，让他的报告文学摆脱同类题材常见的生硬说教与刻意煽情，拥有温润而持久的诗性感染力。

跨文体的叙事实验，则为诗性纪实拓展了更丰富的表达维度，而所有文学探索始终以非虚构的伦理自觉为不可逾越的边界。王国平的报告文学大胆向小说学结构、诗歌学语言、散文学意境拓展。写茶园晨雾的光影变幻，他以纯粹的散文笔法铺陈质感，赋予场景灵动的画面诗意；写人物与家人的日常互动，他借鉴短篇小说的现场感，以动作细节与简短对话替代直白的心理剖析，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心境；在《地球友好，你在奔跑》等作品中，他加入记者的自

我在场视角，记录采访途中的所见所感，以元叙事的方式强化非虚构的真诚质感。这些手法散见于他的散文与纪实写作中，形成跨体裁的审美互通。但他始终拥有清醒的创作伦理，文体实验与文学加工都严格恪守非虚构底线，慎重进行合理想象式的心理杜撰，涉及人物内心世界时，注重以日记、书信、访谈自述或亲近者的回忆为依据，宁可留下叙事的空白，也不用虚构的丰满消解真实的尊严。写人物遭遇意外的关键瞬间，他只呈现目击者的描述与客观记录。“报告文学是文学向时代递交的一份‘证词’。追求真实，或者说真实性、真实感，是报告文学的立身之本，是它的血脉和基因。”^①这份清醒与自律，让所有的文学技巧都拥有坚实的落点，也让他的诗性纪实始终扎根于真实的土壤，从而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

三、人本立传： 人物书写的伦理自觉与时代价值

人是王国平创作的核心，也是贯穿其报告文学、散文、传记、访谈的共同主线。无论是《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当代焦裕禄：廖俊波》中的人民公仆，还是《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里的乡村群体，抑或《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中的建筑大家、《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里的文化长者，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叙事立场，拒绝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以“祛魅化”的还原策略呈现人物的血肉质感，以边界清晰的叙事伦理守护真实的尊严。这种人物书写方式，呼应列维纳斯“他者面容”的哲学观念，真正的伦理关系建立在对他人独特性的尊重与回应之上，而非将他者同化为自我认知框架内的抽象符号。这种一以贯之的写作伦理，最终凝结为建设性写作的独特范式，使其创作在当代纪实文学格局中拥有独特的文体价值与时代意义。

“祛魅化”的人性呈现，是王国平进行人物书写时具有的鲜明特色，也是他所有人物类

①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报告文学篇）》，《文艺报》2015年4月3日。

写作共同遵循的准则。纪实写作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为了凸显人物的先进性或典型性,刻意过滤掉日常性与复杂性,最终塑造出扁平空洞的符号形象。王国平从创作之初就自觉规避这一陷阱,他始终相信,真正的力量来自有弱点却依然选择坚守、有疲惫却依然选择前行的普通人。他笔下的人物不是悬浮的榜样,而是扎根在生活里、有血有肉的人。在《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里,王国平没有把兰辉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模范干部,而是还原他多重的人生侧面,大学时代他是痴迷结构主义、意识流与朦胧诗的文艺青年,走上领导岗位后清瘦得被群众打趣称作“干锅”,看动画片会看得直乐,像个娃儿;对待上访群众和颜悦色,对工作出错的下属却又像个“火炮”般不留情面;常年奔波在山路上,把手机变成了24小时的“群众热线”,甚至给筑路工人即兴写诗。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非但没有消解人物的精神高度,反而让他的坚守与奉献更有重量,正因为他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疲惫软弱,他的选择才更显可贵。

王国平写人,习惯褪去人物的身份外壳,把镜头对准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日常瞬间。在《当代焦裕禄:廖俊波》中,他没有把廖俊波写成不苟言笑的“工作机器”,反而着力呈现其幽默感、急性子甚至小缺点。他开会不爱念稿子,一着急就撸袖子,露出晒得黑白分明的两截手臂;脾气急,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急了还爱拍桌子;他爱在工地上吃盒饭,蹲在路边呼噜呼噜几分钟就扒完一碗。《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中的群像塑造也遵循这一逻辑,没有把所有村民都写成觉悟高的先进典型,而是如实记录不同的声音,有党员干部的积极倡议,有普通村民的观望犹豫,也有老人“别又是搞运动”的质疑嘀咕。受捐地的农户也不是一呼百应的模范群众,从“这树叶子能当饭吃”的反问,到“现在才知道是金叶子”的感慨,完整呈现农民心态的真实转变过程。

这种对“人”的还原并不止于典型报道,而是延续到他的传记与访谈写作。在《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里,他不堆砌头衔与成就,反而着力刻画主人公的日常一面,对地方小吃的喜爱、

与家人的日常拌嘴、在工地上和年轻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较真,让一位工程院院士也是可亲可敬的长者。《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里的名家访谈,也不满足于他们成就与观点的罗列,而是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人生细节,打捞那些被光环掩盖的脆弱、坚守与遗憾。尚长荣在序言中谈及“人一辈子,本来就是要‘负累’前行的。脆弱的人,扛不住,颇为无奈,只好‘趴下’;但总有一些内心强大的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轻盈’地迈开脚步,一往无前,无所畏惧”^①。这也恰好是王国平访谈书写想要捕捉的人格境界,他写的从来不是负重的符号,而是负重却依然轻盈的、完整的人。也正因为始终锚定“人”本身,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无论身份、职业、领域,都拥有打动人心的共情力量。

在人物呈现的方式上,王国平有着清晰而坚定的非虚构伦理边界,这套边界意识同样适用于他所有的人物类写作。“从人物的语言上着手和着意,正是王国平报告文学写作的拿手好戏。”^②他大量使用直接引语与场景还原,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展现内心世界,不越界代替人物虚构心理活动。写人民公仆的家国情怀,他不用自己的评价进行总结,而是引用主人公工作笔记里的原话、身边亲人的回忆片段,让人物精神在真实的话语与行动中自然流露。《当代焦裕禄:廖俊波》里,廖俊波妻子回忆的最后一通电话,一句平常的“等退休了天天陪你”,因为是生命里最后的承诺,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无需作者额外渲染。写普通人的思想转变,他用前后对照的直白话语呈现,《一片叶子的重量》中,阮安丰回望昔日窘迫境遇时常感慨“说难听的”,谈及茶乡致富后的生活则由衷感叹“真的可以”,前后两句朴素口语的对照,胜过任何精心设计的心理描写。写人物的善意与担当,他多用动作细节替代心理抒发,老茶农蹲下身给贫困户理茶苗根须的轻柔、海洋环保志愿者郭文标俯身分拣海面漂浮塑料垃圾的专

① 尚长荣:《序》,王国平:《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② 白烨:《轻中有重 朴中见色——读王国平报告文学〈一片叶子的重量〉》,《文艺报》2021年3月1日。

注、兰辉在山路上俯身查看路况的专注,这些动作本身就彰显出人物的品格与温度。甚至采访对象叙述时的停顿、沉默与犹豫,他也会如实保留,不为了叙事流畅而刻意打磨。这种对真实的敬畏,构成其人物书写的伦理底色,也让他笔下的人物拥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王国平笔下的人物之所以鲜活,正是因为每个人物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方式与行动逻辑,而非作者意志的传声筒。以人为本、恪守真实的写作立场,最终凝结为学界所界定的建设性写作范式,也是王国平报告文学创作独特的文体价值。建设性写作是当代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审美范式,区别于单一的批判揭露式写作与空洞的宣传图解式写作,其核心要义在于,立足客观现实与真实肌理,正视时代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现实困境与实践代价,以平视、包容、建构的叙事姿态,发掘时代建设进程中个体的坚守、社会的进步与内生的正向力量,实现记录现实、反思现实、赋能现实的多重文学功能。

丁晓原精准剖析了当下报告文学普遍存在的两极化创作弊病。他指出,不少创作者深陷“文学性焦虑”^①,疏于深耕事实肌理,一味依赖外在抒情与修辞技巧堆砌文学质感,导致文本空洞虚浮、情感表达泛滥失真;与此同时,大量现实主题报告文学又陷入同质化、模式化的写作困境,刻意简化现实发展的复杂肌理,以固化的叙事范式完成主题阐释,最终沦为机械刻板的概念图解,彻底消解了非虚构写作本真的纪实力量。对此,丁晓原明确界定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审美内核,其文学性并非后天附加的辞藻修饰,而是真实事实本身自带的原生审美质素,创作者的核心任务是深度挖掘事实内在的诗意与逻辑,而非脱离真实基底刻意造作、强行赋能。正是在这种或空洞抒情或固化图解的二元创作桎梏中,王国平的纪实写作跳出非此即彼的创作误区,探索出一条真实质朴、温润厚重的建设性叙事路径。他始终秉持严谨辩证的非虚构写作原则,直面现实困境却不刻意消费苦难,讴歌凡人奉献却不神化、拔高人物,书写时代发展却不粉饰现实矛盾,让整体叙事牢牢扎根真实肌理,兼具纪实的说服力与文学的温度感。《一片

叶子的重量》书写乡村振兴的脱贫硕果时,并未片面歌颂帮扶成效,而是如实呈现脱贫攻坚的曲折历程,记录村民初期的观望迟疑、异地移栽茶苗水土不服枯死的现实挫折、基层扶贫干部遭遇瓶颈时的沮丧困顿。正是对发展过程中艰难与复杂的真实还原,让最终的致富成果、互助义举更具说服力与感染力。

王国平的纪实写作极具鲜明的建设性特质,这一创作特点在聚焦基层干部形象的两部作品《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当代焦裕禄:廖俊波》中得到充分彰显。作者深情刻画兰辉、廖俊波两位基层干部扎根乡土一线、坚守岗位职责、无私忘我奉献的责任与初心,热忱歌颂基层治理工作者的使命与坚守。同时,作品并未刻意美化人物、回避现实,而是坦然直面基层工作的现实压力、治理痛点与履职局限,客观还原基层干部身处岗位的平凡困境与真实生存境遇。这种书写方式打破传统英模题材写作脸谱化、绝对完美化的固化叙事模式,让英模人物褪去光环、贴近现实,形象立体鲜活、真实可感。

立足生态题材的纪实作品《地球友好,你在奔跑》,王国平依旧延续这份真实客观、兼具温度与深度的叙事逻辑。作品聚焦浙江“千万工程”“蓝色循环”“蚂蚁森林”三大生态治理典范,在呈现生态文明建设斩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卓越成果之外,真实记录生态治理、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反复打磨、不断试错与攻坚克难,完整还原绿色发展的渐进过程,让时代发展的进步图景褪去滤镜,变得扎实可信、质朴动人。“无论任何时候,‘真诚’依旧是美学范畴的最高评价。”^②秉持真诚的创作立场直面现实、记录时代,不刻意放大发展中的问题,也不片面美化发展的成果,是王国平纪实写作的基本追求。其作品传递的正向力量,并非源于空洞的歌颂与拔高,而是扎根于真实的细节描摹、诚恳的叙事表达与真挚的人文共情。这种求真务

① 丁晓原:《如何报告,怎样文学——新时代报告文学文体说》,《文艺报》2024年7月10日。

② 李恒昌:《生命的力量与心灵的向度——刘琼〈格桑花姿姿势〉的思想内涵和语言特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实的写作立场,让他的作品拥有穿透文本的共情力与感染力,也为当代纪实文学创作探索出一种更平和、更持久、更具生命力的书写路径。

从更广阔的时代视角看,王国平的创作还具有重要的记录价值与范式意义。十余年间,他的笔触覆盖灾后重建、基层治理、脱贫攻坚、生态文明等重要社会议题,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具有史料价值的时代档案。这些作品保存了大量可能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生活信息,北川山路的重建细节、一个县域的追赶历程、一个村庄的种茶共富史、一位建筑大师的人生轨迹、一代文化长者的精神片段,这些细碎而真实的记录,终将成为未来回望这个时代的鲜活注脚。同时,作为记者转型报告文学作家的代表,他的创作路径为众多媒体人转向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充分发挥职业优势,将新闻的行动力、判断力与文学的审美力、思想力相结合,在真实的底线上探索文学的高度。王国平在《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的写作中,“在‘怎么写’上下了较大的功夫,使自己长于‘巧取’的技法得以充分的施展”^①。作者始终聚焦时代进程中的普通人,用一支笔为不同领域的奋斗者立传,个体清晰、群像生动,以饱含人间温度的文字,刻录下行进中的中国的真实面貌。

结 语

从《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兰辉同志》到《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从《汪曾祺的味道》的散文写作到《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的传记创作,王国平用十余年的持续深耕,构建起多体裁联动、精神内核统一的创作格局。报告文学是他的主要阵地,承载着记录时代、书写现实的社会责任;散文、评论、访谈与传记是他的两翼支撑,

锤炼语言质感,深化人文思考,拓展艺术边界。所有的写作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在新闻与文学的交界处,寻找真实与审美的平衡;在时代与个体的交汇处,打捞有温度的精神价值。

他以时代脉动为选题锚点,构建起从个体担当到社会协同的精神谱系,让纪实写作始终扎根现实土壤;他以诗性纪实为美学路径,在严守非虚构底线的前提下拓展文学表达的边界,让真实的故事拥有诗性的光泽;他以人本立场为伦理根基,坚持“祛魅化”的人物塑造与建设性的叙事姿态,让报告文学回归到“人”本身。那些山间的石子、茶园的叶片、奔波的身影、奔跑的姿态,那些普通人的善意、担当与坚韧,都被他以文学的方式镌刻下来,化作时代记忆里清晰而坚实的印记。

在纪实写作不断探索文体边界的今天,王国平的创作实践有着特别的意义。它证明报告文学可以既贴近现实又富有诗性,可以既饱含正向力量又不失真实品格,可以既发挥新闻的优势又坚守文学的尊严。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唯有保持对现实的真诚关注与对创作的谦卑敬畏,才能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精品,纪实写作就能在时代的大地上扎根,长出有温度、有重量、有持久生命力的果实,为这个时代留下无可替代的文学实录。

【作者简介】何英,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中文教育。

① 白烨:《轻中有重 朴中见色——读王国平报告文学〈一片叶子的重量〉》,《文艺报》2021年3月1日。